

# 论傅斯年的史学方法与网络史料考证

焦润明

(辽宁大学 历史学院, 沈阳 110036)

**摘要:** 现代史学家傅斯年所提出的重视史料以及处理史料的比较与互证方法, 具有代表性。傅斯年的史学理论尤其是他的史学方法论, 在网络史学时代仍然具有适用性。把傅斯年的史学方法应用于网络史料的比较互证与解读上, 并进行新的解读, 可以为网络史学的发展提供新的尝试。

**关键词:** 傅斯年; 史学方法; 网络史料考证

**中图分类号:** K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7-4937(2010)02-0107-05

傅斯年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历史学家, 是现代“科学史学”派的核心人物。他主张“科学的历史学”, 是“与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等同论”那样的历史学。其治史的原则是“一分材料出一分货, 十分材料出十分货, 没有材料便不出货”。对于材料的态度是“存而不补”, 处置材料的态度是“证而不疏”, “材料之内, 使它发见无遗; 材料之外, 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sup>[1]262</sup>。正是出于重视史料对于建构科学史学的重要性, 他认为, 把历史作为一门科学, 就必须重视史料的挖掘和扩充。强调“凡能直接研究材料, 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 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 便退步”。<sup>[1]256</sup>史学研究最重要的是直接接触第一手资料, 只有这样才是科学的研究。大如地方志书, 小如私人的日记, 远如石器时代的发掘, 近如某个洋行的贸易册, 这些都是“直接材料”, 而“去把史事无论钜者功细者, 单者或综合者, 条理出来, 是科学的本事”<sup>[1]256</sup>。史学的进步必须不断地发现新史料, 扩充新史料。在傅斯年看来, “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 不能的便退步”<sup>[1]257</sup>。

为了达到不断地发现新的直接史料, 扩充新资料的目的, 就必须像西洋人那样, 动手动脚到处地去找新资料, 随时地扩大旧范围。他说: “材料愈扩充, 学问愈进步, 利用了档案, 然后可以订史, 利用了别国的记载, 然后可以考四裔史事。”<sup>[1]258</sup>在他看来, 学问的进步是与材料的扩充成正比的, 因此, 为了不断地使史学发展、层累, 就必须不断地收集资料、挖掘资料。傅斯年认为王国维所著《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等文, 利用第一手史料, 证明了《史记》袭世本说的正确性, 改正了史记史料引用上的小错误, 于间接材料之矛盾中(《汉书》与《史记》), 取决了是非, 他还列举了陈寅恪利用异国古文字史料订正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 王国维利用出土汉简, 考订西域建制名称, 罗振玉利用敦煌卷子残篇, 补充《唐书·张义潮传》, 吴大澂对金文中“文”字的考证, 解决了大诰究竟是谁的档案的两千年难题等等。“可见史料的发见, 是以促成史学之进步, 而史学之进步, 最赖史料的增加。”<sup>[2]39</sup>

傅斯年既然非常重视史料在建构科学史学中的重要性, 那么, 如何判断史料, 以及史料的真实性问题, 也就成了其科学史学的学术前提。对于史料的处理也就成了史学的核心工作。他说: “假如有人问我们整理史料的方法, 我们要回答说: 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 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 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sup>[2]5-6</sup>史料有来源的不同, 有先后的不同, 有价值的不同。从这些不同中如何找到、判定出史料的真伪、先后、价值等等, 那就只有依靠比较方法。为此, 他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史料考证与比较方法。

## 1. 直接史料对间接史料

史料在某种意义上大致可以分直接史料和间接史料。在傅斯年看来, 凡是未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

收稿日期: 2010-02-10

作者简介: 焦润明(1958-), 男, 辽宁本溪人, 教授, 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及史学理论研究。

略或转写的 就是直接史料 凡是已经过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 就是间接史料。卜辞、毛公鼎、明档、清档等是直接史料,周书、明史、清史等则是间接史料。

直接史料大致出自地下、古公廨、古庙宇及世家藏书。来自地下发掘出的直接材料主要是金、石、陶器、竹简等,因许多事物很难保存,所以直接史料更显珍贵。如甲骨、敦煌卷子、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等,都是些“断烂朝报”,很少有全书。直接史料虽然支离破碎,但直接史料比间接史料更正确,更可靠。

间接史料虽然也很重要,但其价值不如直接史料。一件历史事件经过千百年,辗转被许多人记载传诵,就可能使事件面目全非。因为任何人都免不了受时代的影响,免不了按照他自己的价值观和想法进行撰写或改动。正是基于此点,傅斯年非常看重直接史料。傅斯年说:“若是我们不先对于间接材料有一番细工夫,这些直接材料之意义和位置,是不知道的;不知道则无从使用。”<sup>[2]8-9</sup>直接史料的史料价值大,但或由于年代久远,或由于人祸、战乱等原因,直接史料很难被完整地保存下来,而保存下来的也多是支离片断,对它的意义只有通过“靠间接材料做个预备,做个轮廓,做个界落”,才能说明;只有通过间接材料的印证、比较,才能说明其意义。直接史料虽然支离破碎,需要靠间接史料进行判断。“一旦得到一个可信的材料,自然应该拿他去校正间接史料。间接史料的错误,靠他更正;间接史料的不足,靠他弥补;间接史料的错乱,靠他整齐;间接史料因经中间人手而成之灰沉沉样,靠他改给一个活泼泼生气象。我们要能得到前人所得不到的史料,然后可以超越前人;我们要能使用新得材料于遗传材料上,然后可以超越同见这材料的同时代人。”<sup>[2]9</sup>

## 2 官家的记载对民间的记载

用官家的记载参照比较民间的记载,这是史料选择中的另一个原则。傅斯年认为,官家记载和私家记载都互有长短,官书在关于年月、官职、地理等方面,有簿可查有籍可录者,往往比私家记载为准确;而私家记载关于一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内幕”方面,有些是官书中不能说或不敢说的。当然也不尽然,私家对内幕也有胡说一气的。

傅斯年在比较了官书与私书的优缺点后认为,官书记载的短处或曰不信处主要在于避讳,“论到官家记载之讳,则一切官修之史皆是好例,所修的本朝史尤其是好例。禅代之际,一切欺人孤儿寡妇的逆迹,剪伐之朝,一切凶残淫虐的暴举,在二十四史上那能看得出好多来呢?现在但举一例:满洲的人类原始神话,所谓天女朱果者,其本地风光的说法,必不合于汉族之礼化,于是汉士修满洲原始之史,不得不改来改去,于是全失本来的意义……犹之乎顺治太后下嫁摄政王,在清朝国史上是找不出一个字来的……清朝人修的太祖实录,把此一段民间神话改了又改,越改越不像。一部二十四史经过这样手续者,何其多呢?”<sup>[2]42</sup>

傅斯年从客观的角度揭示了一个规律,即官修正史都是隐恶扬善的。皇室的乱伦、君主的残暴在当朝史中都是隐讳的。用傅斯年的话说,“这因为官家总是官家,官家的记载就是打官话。好比一个新闻记者,想直接向一位政府的秘书之类得到一个国家要害大事之内容,如何做得到?势必由间接的方法,然后可以风闻一二”。官修正史主要记载那些对统治者有利的内容,凡是涉及出身、种族、篡位等于己不利的事情,都必略去。清史在这方面最为典型。有关满族神话以及本民族较为原始的风俗根性都被修改或略去就是典型的一例。其实,有关事件的分析也是一样。

与官家记载多避讳相对,私书记载又诬谬。对此傅斯年解释道:“人的性情,对于事情,越不知道越要猜,这些揣猜若为感情所驱使,使不知造出多少故事来……大约知道一件事内容者,每每因自己处境的关系不敢说,不愿说,而不知道者偏好说,于是时时免不了胡说。”<sup>[2]41-42</sup>私家记载如果书写人与被记载的朝代、人物、集团等存在着意识形态的对立,历史宿仇的话,那么对方的丑闻、坏事就会详细地被描述、被记载。当然更多地还有主观的好恶。总之,无论官家记载还是私家记载在某些事情的真实性上都有一定问题,而要互相对照,进行考证。

## 3 本国的记载对外国的记载

用本国的记载对照外国的记载,也是史料比较与鉴别的重要原则。本国的记载与外国记载,也是互有长短的。一般来说,外国人论中国问题,往往是隔靴搔痒,简直好笑,然而外国的记载也有它的长处,就是少忌讳,他比民间更民间,如本国往往忽略的最重要的见闻而同时却是最要紧的事,外国就很可能注意到。傅斯年论述说:“譬如有一部外国书说,中国为蓝袍人的国(此是几十年前的话),这个日日见的事实,我们自己何尝觉到呢?又譬如欧美时装女子的高跟鞋,实与中国妇女之缠足在心理及作用上无二致,然而这个道理我们看得明显,他们何尝自觉呢?小事如此,大者可知。一个人的自记是断不能客观的,一个民族的自记又何尝不然?本国人虽然能见其精细,然而外国人每每能见其纲领。显微镜固要紧,望远镜也要紧。测量精细固应在地面上,而一举得其概要,还是在空中便当些。”<sup>[2]45</sup>傅斯年在这里揭示了一个道理,即中国与外国,由于各自所站的立场和角度不同,因而他们在同一事件的记载上就会存在着很大的不同。由此,为互相间的比较提供了可能性。

本国的记载对外国的记载这条原理,在当代中外交往频繁的时代,越发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当代中国人对国内问题的记载,必定会有某种倾向,忌讳很多,有些东西不能写或不便写。然而外国则不然。所以对外国记载的重视尤为重要。

#### 4 近人的记载对远人的记载

傅斯年认为,“近人”主要是指在地域上与发生事件的时间、地点较近的或亲历事件之人;“远人”,主要是指与发生事件的时间、地点较远的人。在他看来,远人的记载比不上近人的记载,因为事实只能越传越失真,不能越传越近真。一个外省人记述京城发生的事,如果其材料凭借的是口述,那就大成问题。不过,在当代信息传播频繁、多文化的时代,远人的记载也应受到重视。笔者认为,傅斯年提出的这条“近人记载对远人记载”原则仍有它的理论指导性。

#### 5 不经意的记载对经意的记载

傅斯年对史料有一个重要的判断标准,就是“每一书保存的原料越多越好,修理得越整齐越糟”<sup>[2]47</sup>。不经意的记载,保存的信息很可能更有价值,尽管在材料上有时因不经意而乱七八糟,轻重不分,但因此也保存了原来史料,不曾受“修改”之劫。相反,经意的记载,由于特别经意,尽管可以使这个记载信实,也可以使这个记载格外不实,“经意便难免于有作用,有作用便失史料之信实”。按照这一标准,傅斯年认为二十四史都不合于近代史籍要求,但只有晋书和宋书最好,虽然晋书中之小说,宋史中之紊乱,是不可掩饰的事实,也是历来史家以为诟病的地方,正因为这样,有许多“不经意”的地方,不过,晋书却保存了一些晋人的风气,宋史也保存了些宋人的现状。

“不经意的记载对经意的记载”这条原则,把它放到现在史学研究中仍有现实意义。不经意的记载,也可以看成是作者无意中记下的某件事、某个问题,在发生事件的当时,作者还并不一定明白其中的重大意义。因此,他只是客观地记录。这种材料当然最为可信。经意的记载,则可看成是作者对某件事情已有一定的认识,知道它有意义,知道它重要,因此,作者可能把事件记载得详细、完整,也可能对事件进行歪曲。相对来说,经意的记载比不经意的记载,可靠性要差些。

#### 6 本事对旁涉

这条原则由“经意记载对不经意记载”引申而来。“本事”指的是作者直接记载或描述“甲”件事。“旁涉”则指的是作者在记载或描述“乙”件事中,涉及“甲”件事。由于是“旁涉”甲件事,因此,从利用史料的角度进行判断,作者有可能是“不经意”的流露,所提线索可信度要大些。当然,这只是在一般情况下如此,不能一概而论。有时,作者限于当时的避讳或当时的条件,不便在正文中明提,那就可能在“旁涉”中有意露出些蛛丝马迹来。对此,傅斯年论述道:“本事对旁涉之一题,看来像是本事最要,旁涉则相干处少;然而有时候事实恰恰与此相反。因为本事经意,旁涉不经意,于是旁涉有时露马脚,而使我们觉得实在是另一回事,本事所记者反不相干矣。有时这样的旁涉是无意自露的,也有时是有意如此隐着而自旁流露个线索的,这事并不一样。”<sup>[2]47</sup>

“本事”与“旁涉”都是有史料价值。很多线索是“旁涉”中提到的。例如,在写人物传过程中,除了被传述人本身留下的作品外,被传述人早年的人际交往中的某人,在不“经意中”留下的某些有关自己对被传述人的评价的这种“旁涉”资料,很可能更为珍贵。此外,史家在考证历史事件中,通过大量的“旁涉”资料来论证“本事”,也非常有力。当然,有很多“旁涉”本身又是相当珍贵的历史资料,对此,傅斯年就强调说“汉武帝是怎样一个人,史记中是没有专篇的,因为‘今上本纪’在西汉已亡了。然而就太史公东敲西击所叙,活活的一个司马迁的暴君显出来,这虽不必即是真的汉武帝,然司马迁长心中的汉武帝却已借此出来了”<sup>[2]48</sup>。在这段论说中,傅斯年已就司马迁在所著《史记》中利用“旁涉”的功能,对汉武帝的评价,巧妙地论述了“旁涉”的价值。

#### 7 直说对隐喻

直说即经直之说,不曲笔,不隐讳,隐喻则与直说相对,凡属作者不便说,又不能明说的内容就需要通过隐讳、暗示的方式进行表达。对此傅斯年论述说:“凡事之不便直说,而作者偏又不能忘情不说者,则用隐喻以暗示后人。”<sup>[2]48</sup>他认为俞伯平在《长恨歌及长恨歌的传疑》一文中,比较巧妙地挖掘了“隐喻”的作用。在文中,“汉皇重色思倾国”、“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等句都是隐喻。傅斯年认为俞伯平这篇《长恨歌及长恨歌的传疑》是一篇分析历史文献“隐喻”用法的好文章。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在叙述亲身经历的事件时,对那些带有敏感政治性的事件,对那些自己不便说,不敢说又不得不说的内容,往往采用“隐喻”或“曲笔”的手法。因此,在利用这样的资料时,历史工作者必须有对“曲笔”、“隐喻”的认识,才能挖掘历史资料的深刻内涵。

#### 8 口说的史料对著文的史料

口说的史料与文字的史料在历史研究中都有一定地位。但一般都认为,口说无凭,文书有证,它们之间的优劣判别一目了然。但实际上“笔记小说虽是著于文字的材料,然其性质实在是口说”。傅斯年

认为口说材料也应当受到重视 因为在各民族早期发展史上, 很多材料来源于“口说”(口碑相传)。“国语(左传一部分材料在内)之来源即是口说的史料, 若干战国子家所记的故事多属于此类”<sup>[2]60</sup>。他认为口碑史料能保存许多重要的历史资料, 如许多神话故事都是据口说整理而成。此外, 宫帷遗闻、朝野杂事等, 也都在民间口头留传, 很有价值。

在谈到口说史料的整理和保存的重要性时, 他论述道:“古代及中世之欧洲民族所有之口传史料, 因文化之振兴及基督教之扩张而亡遗, 独其成为神话作为诗歌者, 以其文学之价值而得幸存, 然已非纯粹之口传史事矣。近代工业文明尤其是扫荡此等口传文学与史事者, 幸百年之前, 德俄诸国已有学者从事搜集, 故东欧西亚之此等文学与史料, 尚藉此著于文字者不少, 而伊兰高加索斯拉夫封建之故事, 民族之遗迹, 颇有取资于此, 以成今日史事知识者焉。”<sup>[2]60</sup>口头相传的各民族远古历史、上古神话, 固然有价值, 但需通过收集、整理并用文字记录下来, 才能得以保存。欧洲口碑史料得以保存, 并成为今天历史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得益于德、俄等国学者的努力。傅斯年也承认口头史料有时也缺乏精确性, “每每将年代, 世系, 地域, 弄得乱七八糟”<sup>[2]60</sup>, 因此, 文字史料显得更为精确可靠一些。这正是“口说的史料对着著文的史料”这一原则成立的前提。傅斯年强调把口头史料对应文字史料作为资料考证的原则之一, 目的在于告诫人们在利用文字材料的过程中, 不要忘记了口头材料的重要性。口头对于文字, 就是在对比中发挥所长, 避免所短, 给人以准确的历史知识。

### 三

傅斯年对史料的认识以及其所提出的史料的考证与比较方法, 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直到今天, 对于纸质时代的历史学研究仍有参考价值 and 指导意义, 即使对于网络时代的史学研究, 其史学方法仍有借鉴价值。以历史学为例, 当下历史资料的大规模电子化、数字化, 就是过去十年间所不曾想象的。其实,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就已在学界悄然兴起了大规模的“换笔运动”。历史学科在适应信息化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新的学科形式, 产生了它的新的边缘交叉学科——网络史学, 一种区别于既往纸质史学的电子史学。这是我们治史者所不得不面对、不得不思考的重要课题。

既然信息已渗透于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 数字化生存已成为我们无法回避的生活方式, 我们治史者就必须面对互联网这种新的信息传输与获得方式。利用网络进行史学研究, 首先遇到的就是网上史料的收集、考证问题, 对此, 传统史学的知识和智慧可以借用于此。我们认为, 史学家傅斯年先生所提出的重视史料以及关于史料的比较与互证的方法, 可以通过改造以应用到网络史料的收集与考证。

网络史学的史料来源极其广泛, 纸质的、电子的、图像的资料全部可以成为其资料来源。其中, 纸质史料的范围大致有古代传下来的历史典籍, 如二十四史、四书五经、历代史书、方志, 图像图画等; 历朝历代所遗存下来的档案资料; 今人的著述, 如研究著作、论文、小说、诗歌、绘画作品、音乐作品等; 从近代到现在所发行的成千上万种报纸、各种纸质商业广告; 各种艺术作品; 各种日记、纸质版照片、图像等。电子文本史料主要限定在原是出自纸质文本后被电子化的传统典籍及各种著述。目前, 无论是印刷文档、手写稿, 还是音像文件、遗址与文物, 都在逐渐地被数字化、电子化,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史料数据库逐步成为潮流。此外, 与纸质出版物同源的孪生“拷贝”的电子文本出版物资料, 各种官方网站上发布的政策法规、行业规定及信息等资料, 国内外各大历史网站所发布的史料, 网络上流布的可以作为史料对待的各种信息等, 可供研究不同问题的专家参考使用。

尽管到现在为止, 网上史料还极为有限, 然而由于网络的无限扩张性特征, 决定了网上史料将会以几何级数急速增加, 网上资料有可能会成为将来史学发展的占主导地位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 从历史学角度看, 当前正面临着如何对待和处理这些电子化了的网上史料, 既如何解读与考证网上史料的问题。笔者认为, 在“网络考据时代”傅斯年的史料比较与考证法仍然有其有效性。从网上史料来源的角度看, 确实存在着史料的真伪及史料价值判断问题。

#### 1. 关于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的比较与互证问题

在网络上首先表现为电子史料与纸质史料的互证。现阶段的电子史料中相当大部分来源于纸质史料。从纸质史料转化为电子史料的过程中, 由于技术的局限性, 难免会出现失真或错误之处, 其真实性和可靠性也将会大受影响。因此在使用电子版史料时, 必须仔细地与其相对应的纸质版本史料核对互校, 诸如版本目录是否一致, 内文是否有缺失, 页码是否相同以及内容上是否被改写等等。电子史料也有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之分。比如在网上发布的布告、人事变动信息、会议信息以及法令、规则、物价等等, 都可算作直接史料, 而网上论文、报道以及其他摘发或被转引的内容皆属间接史料。因此, 分清两者意义重大。

#### 2. 关于官家记载与民间记载的比较与互证问题

这里主要指官办网站史料与民间网站史料的互证。官办网站也可以称为“公家”网站, 民间网站也

可以称为“私人”网站 这里主要指个人网站、或民营企业、民间社团所创办的网站。从史料的角度来看,官方网站上所发布的史料往往是符合统治集团利益或体现统治集团价值标准的史料。凡是涉及相关政治人物的材料,符合主流者一定多为正面材料,不符合主流者一定多为负面材料。凡是有违于这一标准的材料,一般是不予发表的。当然,官方网站上所发表的史料可能会更规范、更标准,材料上也可能更丰富。这些都是民间网站难以比拟的。与官方网站相比,民间网站的正统意识形态色彩会淡化一些,而非主流的、多元的内容则会多一些。因在官方网站上想找到个人随意发表自己看法的材料是很难的。而官方与民间的这种差异,恰恰给我们提供了史料互证的绝好空间。

### 3 关于本国记载对外国记载的比较与互证问题

这里主要是中国国内网站史料与外国网站史料的互证。国内历史网站所刊发的史料或相关历史著述中,凡是涉及政治制度、民族关系、国家安全、国家利益以及政治领袖人物评价以及其他触犯政治禁忌等方面的内容,一定会受到国家意识形态以及具体的政策法规的诸多限制。这就有一个什么内容能发什么内容不能发的情况。历史时代的内容如此,当代的内容更是如此。这种情况,各国亦然。由此就存在着一个国内网站与国外网站在刊发内容上存在着巨大差别的问题:即在国内网站上不能说或不便说的史料,在外国网站上就能说就方便说;在国内网站上找不到的材料,在外国网站上就能找到。在国内被赞同的事物,在国外就很可能被否定甚至被攻击。这种差异性就为历史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材料互证的前提。

### 4 关于近人记载对远人记载的比较与互证问题

网上史料有纸质转化来的,亦有直接以电子文本形式发布的,所以,存在着相关的比较与互证问题。在当代信息传播频繁、多文化的时代,远人的记载更应受到重视。因为从地域上看,现在的远人可以是别国人或是几万里之遥的人,其所发布的历史可能与当事人、当事国无关,故更为真切。

### 5 关于不经意记载对经意记载的比较与互证问题

这里主要指网上有意记载的史料与无意记载的史料的互证。当代人对于国际问题、国家大事的认识和评价,几乎都可以通过网络来表达。因此,凡是国内国际上发生的大事小情,都会有好事者在网上留有记录、表白和评价,从而成为有意记载。同时,网上还充斥着大量涉及相关内容的无意记载。例如,甲国人到乙国旅游,无意中遇到了乙国发生的某一事件,他在游记中记录了下来,事后发表在自己的博客上;或者某人亲身经历了某件重大的事件,他把它作为一种重要的经历记录了下来并发布到网络上。由于相关人士与所述事件没有必然联系或者在无意中记之,便成为无意记载。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对于网上有意记载的史料的真实性,只有通过将其与网上无意记载的史料进行互证之时,才可能得到最大限度地验证。通过相互对照考证,可以发现不同材料的叙述是否一致,是否漏掉了某些细节,对事件的评价是否带有个人偏见等等,从而保证了相关材料运用的客观性。

### 6 关于本事对旁涉的比较与互证问题

网上的专题史料,大部分为专说史料,即为专门记述某一事件或某一人物的史料。兼说、旁说史料指的是在叙述甲人甲事时,会兼及到乙人乙事,是为兼说、旁说。兼说旁说史料可能内容更真实,更有价值,可以作为专说史料的旁证和补充。

### 7 关于直说对隐说、曲说史料的比较与互证问题

网上史料同样会存在着直说与隐说、曲说的情况。在网上有很多直截了当地批评某些政治集团的施政方针或做法的文字,或者是对某些社会现象的批评,是为网上直说史料。这类史料多出现在那些不易受到政治迫害的、相对较为宽容的国家和地区的网站。所谓网上隐说、曲说史料,主要是指那些对某些社会现象持批评态度,但由于有政治或其他方面的顾忌,只能采取隐说或曲说的方式。比如说得非常隐讳,如以拟人的手法表述某件事,或者正话反说,或者反话正说,以扭曲的方式表述作者的想法。这两类史料都有其可取之处,只有把这两类史料结合起来考虑,才能真正地把握事情的原貌。

### 8 关于口说史料对著文史料的比较与互证问题

在网络时代,与著文史料相关内容对应的口述史料很容易在网上找到。由于某些事件参与的当事人众多,或目击者众多,鉴于事体重大,在参与者或目击者中有很多人会将个人的经历或体验用回忆录的形式在网上发布。由于网络的发达,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有机会将他们过去的经历在网上公布出来。只要下工夫广泛收集网上的口述史料与网上相关的著文史料,将两者对比研究,就一定会有益于历史研究。

参考文献:

[1] 傅斯年全集:第4册[M].台北: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

[2] 傅斯年全集:第2册[M].台北: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

〔责任编辑:时妍〕



► **刘忠孝** 1953年生。现任哈尔滨师范大学研究生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黑龙江省高校思想品德课教研会常务副理事长、秘书长，中央教科所德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等。被评为全国高校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全国优秀教师、全国普通高校首届百名“两课”优秀教师，主要从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主持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专项任务项目各一项、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等多项。在《光明日报》、《思想教育研究》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出版《中华传统儒家人文化研究》、《思想道德修养》等全国高校统编教材和学术著作十余部。在本刊发表论文《关于深入开展反腐倡廉工作的新思考》（2007年第5期）、《儒家和谐观念论》（2008年第6期）、《试述中华传统儒家人文化的当代价值》（2010年第2期）。



◀ **夏建中** 1952年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基地专职研究人员、《世界社会学》杂志中国编委。主要从事城市社会学、社区研究、公民社会、生活方式以及文化研究。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美国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德国波恩大学和比利时欧盟委员会等大学和机构进行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活动，是美国富布赖特高级访问学者和美中学术交流学会访问教授。出版过多部专著、译著，并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主持过中欧高等教育合作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福特基金会资助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多项。在本刊发表论文《从街居制到社区制：我国城市社区30年的变迁》（2008年第5期）、《治理理论的特点与社区治理研究》（2010年第2期）。



◀ **焦润明** 1958年生。现任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法学博士，辽宁省重点学科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带头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同行评议专家、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评审委员会学术委员。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近现代思想文化史、史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主持过国家级和省级课题多项，获省、市级科研奖励十余项。在《历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国家级和省级核心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出版《中国近代文化史》、《梁启超法律思想综论》、《傅斯年传》、《梁启超启蒙思想研究》等六部个人学术专著及多部合著。在本刊发表论文《论傅斯年的史学方法与网络史料考证》（2010年第2期）。